

第一部

新疆史前考古发现

第一章 史前遗存

新疆的史前遗存过去很少被人知晓。斯文·赫定 1900—1901 年自新疆带回的采集品，为我们提供了那里石器时代的第一条线索。这些采集品中包括两枚石制品：一枚是看上去像玛瑙石的单台面石核，另一枚是黄色燧石石片（见贝格曼 1935c, PL. IX: 2—3）。这种尺寸很小的石制品是典型的新疆及蒙古石器时代的物品。在最近 30 年中其他探险者又陆续发现过一些这类石制品。赫定的两件物品拾自风蚀地表，因此无法根据地质层面进行断代。自石制品的形状上，亦无法判定其年代。

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得到的 450 件石制品更典型些，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肯定是否根据它们便能获得较为精确的年代测定。H. A. 史密斯对这些石制品已作过论述。

斯坦因在玛拉巴什^①地区的柯克塔格（Ckok - tagh）东南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几个地点，亦发现过一些石制品（见斯坦因，1928, 85 页）。其中包括两枚石核、一枚石镞、一个尖状器、8 块石片和一些无法归类的石制品。他在讨论另外一些史前考古发现的论文中没有涉及到这些物品。但是他曾推测这些石制品属于旧石器时期。我认为似乎不大可能，而且解释不通。

在库车附近的库木图拉（Qum - tura）伯希和（Pelliot）^②曾购

① 玛拉巴什，即今巴楚。

② 伯希和（1878—1945），法国考古学家、中亚探险家。

得两把玉质石斧，它们现在被陈放在圣日尔曼博物馆（Musée de Saint Germain）中（见伯希和 第 9 页）。从这家博物馆我获得了石斧的照片，此时我才知道实际是 3 把石斧而不是两把。在讨论罗布泊石斧时我还会提到它们。

斯文·赫定领导的中瑞联合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这一领域又有新的发现，本书中提到了该团中除袁复礼博士和黄文弼先生^①之外，所有其他成员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此次袁复礼在博格达山脉以北及哈密发现过一些彩陶（毕肖普 Bishop 曾在其文章中提到过这些彩陶），黄文弼在雅尔和图（Yar - khoto）^②也发现了彩陶，本书后面讨论我在托克逊的考古发现时将涉及到黄的发现。

我们考查团的大部分成员离开新疆后，德日进（Pere Teilhard de Chardin）^③于 1931 年作为中法雪铁龙—哈特（Citroen - Haardt）考察团^④的一员，曾沿连接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喀拉沙尔^⑤和阿克苏的大路做过一次长途旅行。这是一次著名的融地质、古生物及考古学为一体的研究之旅。途中穿越了被他称为新石器时期的 3 个不同遗址。第一个遗址位于哈密西北西 81 公里处的三道岭子（San - tao - lin - tze；该地常被称为塔兰奇〔Taranchi〕）。第二个地点靠近七角井子，在通往哈密的岔路口

袁复礼（1893—1987）地质学家。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黄文弼（1893—1966）考古学家。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著有《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等。

雅尔和图，又译为“雅尔湖”。即今吐鲁番的交河古城。

^③ 德日进 法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曾长期在华工作，参与了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

所谓“雪铁龙—哈特考察团”，即 30 年代初成立的中法考察团。由雪铁龙汽车公司资助，哈特是法方负责人。

喀拉沙尔，即今焉耆。

上,一条岔路由此去吐鲁番 另一条去古城子^①。这两个地点均位于天山山脉之中。第三个地点在沿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的天山山脉西段南缘的阿克苏。他在那里发现了一系列存有大量破碎的石头、手制陶器和小片灰烬的史前人类居住地。阿克苏的史前遗存与另外两处不同,且与已知的各种史前文化没有关连,故其年代很难断定。天山中的两处史前文化遗址似乎属于广泛分布于蒙古及满洲的新石器时期文化。

1928年,我们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一名中国学生刘衍淮,在七角井子发现过燧石石器,其类型与内蒙古石器非常相似。虽然不能绝对肯定,但是德日进与刘衍淮很可能穿越的是同一地区。

即便添加了这些新的线索,我们对新疆史前文化的了解仍极不完整。

在叙述自己在新疆的史前考古发现之前,我必须首先声明,文章没有严格地按照文物发现的时间顺序编排,除少数例外,叙述的次序是以地域为组进行编排的,而有些部分正好与遗址的发现顺序相重合。

^① 德日进在他书中的图 13,向我们展示了一件形状怪异的石器,我在内蒙古包头北 130 公里处的巴音博格都 (Bayen - bogdo) 也曾发现过一件与其类似的石器。但是我的石器没有被德日进称为“尖”的小喙。我不明白如果只是打算作为雕刻器,为什么这两件石器会在其“核的表面”打出如此锋利且专门修理过的一个复刃切割器的边缘和一个“刮削器的边缘”因此我想它们是刀与刮削器的复合体。——原注。

^② 刘衍淮,字春舫。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 4 个气象学生之一。

第二章 彩陶遗址

庙 儿 沟

我们在新疆遇到的第一个具有古代遗存的地点，在小绿洲庙儿沟，这里是我们自东面沿北驼路穿过黑戈壁后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有居民聚居的地方。这个维吾尔人居住的小村可能还有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维吾尔名字，它坐落在天山最东段的南坡，大约位于哈密东南东 85 公里处，村子的四周全是沙漠，天山在这里被称为哈尔里克 (Qarliq - tagh)。1928 年 1 月，我们第一次来到此地时，村子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就是在这一次我们发现了古代遗存。1934 年，我们第二次来此时，小村庄已在新疆的内战中变为一片废墟。

穿村而过的小溪流至村南不远处一排排低矮的岩石丘陵中，就是在这里小溪的西面，有个年代尚须进一步考证的小土屋，见 PL. Ib。这是一座古代庙宇的残迹，村子便因此而得名。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小溪流经这座庙宇，而是庙坐落在小溪的西面。在土屋周围大约 100 米的范围内，我们自地表拾得一些陶器碎片，在地面以下 10 厘米厚度的黄土层中亦有这类遗存。

一些陶片表面施彩，但不幸的是这些陶片都非常小。陶器呈红色或橙黄色，器形各异，胎厚在 3—13 毫米之间。彩绘有黑色线条或红色宽带纹（见 Pl. 2:1—4）。Pl. 2:3 是一块器皿柄残片，上面有云杉枝纹彩绘，这类图案也出现在另一个器皿柄上面。

通常素陶要比彩陶粗糙些，但两者陶色相同。

一块粗质陶片为器物边缘(文物号 K.13328:44)在器柄上方有短小的雕刻线。另有几块陶器边缘残片，在边缘处不同程度地加厚并带有手指压印(见 Pl.32:6)。Pl.32:5 是一块带有较厚边缘的陶片，但他的边缘构成一弧形，也许这是一个器物柄。Pl.32:7 是一块非常小的杯子的残片，环杯口有一排雕刻的逗号状花纹。

各种尺寸的素陶器柄很常见，它们的大部分为竖向环状柄，但也有呈水平向的耳状柄。

我们拾得的陶器底部碎片显示这里的陶器均为平底，器壁与底成大钝角，但是对于这些器皿完好时的形状，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陶器从小杯子到中等尺寸的罐子均有。

这里的大部分陶器可能为史前遗物，但是那些素陶中的一些似乎文化年代较晚，也许是汉代或更迟时期的遗存。

在这里发现的唯一石器是一把原始石锤的一部分，它的中间有个柄孔(见 Pl.4:21)。其不锋利的边缘有磨损的痕迹。我们完全不能肯定它是否是史前遗物。目前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件类似的物品是贝格尔·柏利(Birger Bohlin)在甘肃西北的回回城子(Hui-hui-cheng-tze)^①发现的石锤残片，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唐代钱币(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品，文物号 K.13557:5)。

胜 金 口

胜金口是胜金(Sengim)河谷的出山之口，其地理坐标位于吐鲁番东 33 公里，哈拉和卓(Qara-khoja)北 9 公里，天山余脉与吐鲁番盆地的交界处。在河谷口小清真寺的南面，我们自地表拾得

回回城子，或许是指惠回堡(新民堡)。

几块彩陶碎片。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没有对这个地点做真正的调查。(图 1)

这里的陶器为红色，质地坚硬，胎泥中含少量相当粗的沙颗粒。所有陶器颜色相同。极少数陶片在两面施深红色陶衣，彩绘由黑色线条构成。Pl. 2:5 是一阔口陶碗口沿，另外还有两块陶片上面具有与该陶片相同的竖向双平行线彩绘图案^①。陶片中有几块为阔口碗的口沿，这些碗可能相当浅。Pl. 2:6 中陶片具有稍复杂些的折线彩绘图案。图 1 中是一块薄胎器皿残片，但其他陶片的厚度均在 7—8 毫米之间。

J.G. 安特生教授曾善意地提醒我，注意这些陶片与他在甘肃发现的彩陶在基本特征上存在的类似，具体地说它们与被安特生命名为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的中间阶段彩陶类似。他在甘肃的发现尚未正式出版。

在 T.J. 阿恩 (T.J. Arne) 教授自土库曼斯坦草原出土的彩陶物品中 我们发现了一件与我们的陶片在质地、颜色和彩绘图案等诸方面特征都极近似的例证。这两件相似的陶片分别是本书 Pl. 2:6 中所示的陶片和一块来自卡其特帕 (Chakhir - tepe) 的陶片 (见拜林埃辛 [Bylin - Aithin] 图 16)。然而我不想仅仅依据一块来自吐鲁番的陶片与另一块来自里海地区土库曼斯坦的陶片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 便下结论 认为两地存在着某种文化联系。这不仅因为缺乏更多的证据 而且也因为很自然 这种近似不能被当作任何可靠结论的基础。

^① 参见一件在俾路支资霍布 (Zhob) 出土的陶器上面的彩绘 (见斯坦因, 1929 年, Pl. X, MM. Nil)。——原注

托 克 逊

1928 年，我们在自吐鲁番去托克逊的路上发现了一处彩陶遗址。我们行进的大路正好穿过这片遗址，由于同时还发现了一些人类牙齿，估计那里可能是一片墓地。这个地点距托克逊河北岸约 100 米，在河上架设的桥梁以东不足 1 公里处。那里的土地为黄粘土 再向东一些 有一些小的风蚀雅丹脊 。

所有陶片所反映的陶器形状与彩饰均相同，并且器皿可能只有一种类型。

这里的陶器胎极薄 呈浅砖红色 质地很好(图 2)

陶器外表面有黑色竖向条纹，自上缘直达底部（见图 2 及 Pl. 2:8、9）。器口内侧，绘有一排黑色连续三角纹。外表面及口内侧上部施红色陶衣。长环形器柄表面有两或三条斜向平行线构成的装饰条带。这些条带或平行排列或呈之字形排列（见 Pl. 2:7）。器柄端接上缘及器体的最粗部位。球形器体的颈部渐向内凹，形成柔和的内凹曲线。我们没有发现器皿的底部残片，但是根据其他部位的残片判断 它似乎应是圆形。如果器皿具有平底 则该底一定非常小。

托克逊的陶器都很小，其形状大体上应类似于图 3 样式 但颈部稍短些 不像图 3 中陶器的颈部那样明显。器柄与图 3 完全相同。图 3 中陶器系由我们考查团的一员黄文弼先生自雅尔和图西北 2 华里处的一座墓葬中出土，该地位于托克逊东北东 40 公里处。黄先生发现的陶罐非常重要，罐体彩绘使人联想到一只车尔

雅丹 即维吾尔语奇形怪状的桌形小粘土台地之意 是一种风在古老地表长期侵蚀后留下的地貌特征，在罗布荒漠常见这种地貌特征。——原注。

臣陶瓶(见 Pl.1),由此可推断那只漂亮的陶瓶与托克逊的这一只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雅尔和图陶罐与托克逊的陶片一定比车尔臣陶瓶的文化年代要晚,器体花纹的不同艺术质量已经显示出了这一点。托克逊及雅尔和图的陶器给人以较晚期的、退化了的印象,有别于所有已知的彩陶制品。

黄文弼将他的陶罐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 500—前 200 年之间。

在雅尔和图遗址,黄还发现了一些彩陶残片(见黄文中 2—3 页图)他认为这些陶器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但在公元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在使用”。在该遗址北面的一座墓葬中他还发现了一把石斧,并断定是新石器时代的物品。他对其著作中图 2:20 中所示的红陶器皿的年代估计是:起源于公元前,但在公元后仍在使用。(图 3)

我没有见到黄先生采集品的实物,我对这些物品的印象仅来自他的插图。据我看来黄似乎将文物的年代定得过迟,将其定为公元前 500 年可能更接近于实际的情况。

在黄文弼书的图 12:17 中出现的圆筒形陶器,很像安特生在甘肃镇番^①地区发现的陶罐(沙井期)与那些陶罐同时出土的物品还有鄂尔多斯风格青铜饰物。安特生将它们的年代定为公元前 500 年或略迟的时期。

这些筒形陶器在形状上完全不像陶器,黄认为他们更像罗布泊地区出土的着漆木器,这种比喻是相当正确的。然而形状的类似不一定就意味着年代的一致。罗布泊的木器明显的是由中原传入的汉族器物,其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 1 世纪。而筒形陶器的形

① 镇番 即今民勤。

② 沙井,是中国原始文化遗存地之一。安特生曾以沙井期为其中国原始文化六个分期的最后一期。

状可能与更早期的非汉人木器有关。

如果黄氏得到彩陶罐和筒形陶器的墓地的使用年限不是很长，那么这些不同种类陶器的年代将不会相隔很远。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 500 年前后。我在托克逊发现的陶片比黄文弼的陶罐在风格上有一些退化，但是这种差异还没有大到可以断定二者在年代上存在着不同。

在吐鲁番盆地西部的发现似乎与安特生的沙井期相对应，虽然两地出土的彩陶没有相似之处。

车尔臣陶瓶

1928 年 8 月在车尔臣 我自一中国商人处购得 Pl.1 所示的美丽陶瓶。据出售者讲，这只陶瓶来自位于今车尔臣绿洲边缘的考纳沙尔(Kohna - shahr) ，有关此处遗址的情况我会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进行讨论。如今要确定这只陶瓶出土的确切地点已不可能。只要当地人打算卖给我任何一件物品，不论其属于什么年代，他们都会说该物是从考纳沙尔 意为旧城 得到的 而在大部分情况中这是真实的。然而考纳沙尔 的古代遗存的历史时期绝不早于汉代 其中大部分为宋、元时期的遗迹。但可以相当肯定地说 这个陶瓶是汉代以前之物。在我看来，几乎不存在是从很远的地方发现了它，再特意把它带到车尔臣河流域的可能性。如果事实上它不是自考纳沙尔古城内挖出的，其出土地点也一定会在车尔臣地区。

自下文中的明细表及 Pl.1 可知该瓶瓶体为球形，瓶颈略上扩。除最下部外 器皿通体饰以彩绘 在红色陶衣之上施黑色及乳白色双彩。瓶颈绘菱形网格纹，瓶体是一种“火焰纹”及流苏纹。

① 这里的‘考纳沙尔’即指且末古城。

彩绘十分精美，给人以愉悦感。自照片中无法真正体验到原物所具有的温暖、柔和的感觉。胎为橙黄色 相当薄 这件器皿总能勾起人们对托克逊陶器的记忆。

瓶的造型及那些优美的彩绘构成了它那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设计，这也使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很难较精确地确定其年代。它既不像安特生教授在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彩陶 亦不像印度、近东或东南欧地区的彩绘陶器。

瓶口内侧有托克逊陶片上出现过的黑色连续三角纹。另外，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基本的类似，如成组出现的竖向排列花纹，但托克逊陶器在形状上已出现退化，彩绘也较简单。从这一点看，车尔臣陶瓶似乎在年代上较托克逊陶器古老。而从陶瓶的风格、色彩及质地判断，它似乎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

庙儿沟、胜金口、托克逊、车尔臣采集品明细表

庙儿沟采集品

- K.13328:1 陶片：器皿边缘。上缘有黑色空心三角纹，边缘处可能曾与器柄相连。红陶。胎厚 5 毫米。见 Pl.2:1。
- K.13328 2 陶片，薄胎器皿边缘。浅红色，沿边缘有黑色条纹。
- K.13328 :3 陶片 大口器皿壁。口内有一道线脚并施竖向黑色条纹彩绘。红陶。
- K.13328:4 陶片，器皿颈部。黑色竖向条纹自器口向下仅延伸 1 厘米。陶色浅红，施深红陶衣。
- K.13328:5 小陶片，一个小陶器的颈部。靠近器口处有一些短的竖向黑色条纹。陶色浅红。
- K.13328:6 陶片 阔口碗边。沿口内侧 有一条 2 厘米宽的红彩。外表面可能施红色陶衣。厚胎。浅红色。

- K.13328:7-8 两个环形陶器柄残段。红色陶衣上施黑色“云杉枝纹”。陶色浅红。
- K.13328:9 陶器柄残段。柄上端与器口相接。可见黑彩痕迹。红陶。
- K.13328:10 陶器柄残段，很粗。外表施深红色陶衣。宽 27 毫米。
- K.13328:11 明显地是一高颈器皿的残片，内侧有 4 根黑色条纹，可能是竖向排列。红陶。
- K.13328:12 小陶片，红衣上带黑色网格纹。
- K.13328:13 小陶片，深红色陶衣上施黑色细条纹，可能为一“云杉枝纹”的一部分。陶色浅红。见 Pl.2:4。
- K.13328:14-27 14 块出自几个器皿的小陶片。所有陶片在略显深红的陶衣上面都带有几道黑色条纹。全部为红陶。胎厚 3-8 毫米。其中 16 见 Pl.2:2。
- K.13328:28 一个相当大形器皿的残片，带有一紫色线条形成的三角纹，角顶点内绘一小点，三角纹外侧施浅褐色陶衣。陶色浅红。
- K.13328:29-40 12 片陶片。有黑色或深红色彩绘痕迹，陶色为深浅不同的红色。
- K.13328:41-43 3 块陶片。有深红色彩绘痕迹，陶色浅红或橙红。
- K.13328:44 一个相当大的陶杯边缘。具有一竖向环形柄。红陶。
- K.13328:45-47 3 块陶片，每块上面有带较清晰深指压纹的线脚。其中 46 较彩陶质粗 45 见 Pl.32:6。
- K.13328:48 陶片，一个小器皿的肩部。有一弯曲形线脚，上带斜向压纹。硬烧红陶。
- K.13328:49 陶片，出自一个大器皿，上面的一个半圆形线脚

- 构成了器物柄，柄上带有用小棍斜向压出的深痕，陶质与 46 相同，见 Pl.32:5。
- K.13328:50 一个非常小的器皿边缘，在短颈上有一排小的竖向刻线。黄陶。胎厚 4 毫米。见 Pl.32:7。
- K.13328:51 器皿口沿。沿边缘刻十字纹。施绿色陶衣。质地不同于其他陶片。
- K.13328:52 薄胎陶片，表面有最后进行细加工时留下的条纹。
- K.13328:53-55 3 块陶片可能出自同一件器皿，有雕刻的索环和用三齿工具划出的条带。这几块陶片及 52 号陶片可能较本次出土的其他陶片的文化年代晚。
- K.13328:56 大陶片，出自厚胎器皿，上面有不经意刻出的线条。陶色浅红，质坚硬。
- K.13328:57 大腹陶罐口沿。口沿外翻与肩部相连。厚胎。陶色浅红 罐口直径约 19 厘米。
- K.13328:58-63 6 块小陶片，均出自器皿边缘。
- K.13328:64 陶片，为一小器皿的球形器体部分，带有一半圆形器柄 柄长 15 毫米。陶色浅红。
- K.13328:65-88 24 块不同程度残缺的环形器柄残片。多数断面呈扁平状，也有一些为卵状截面。陶色呈深浅不同的红色。柄宽均约 2-3 厘米。
- K.13328:89 小陶片，带一竖向吊耳。自陶片的两面相向钻孔，但两个孔没有相遇。有黑彩印迹。红陶。
- K.13328:90 陶器柄残片，柄的类型可能与 49 相同。
- K.13328:91 竖向吊耳残片比 89 吊耳大，上面没有钻孔。陶色红褐。
- K.13328:92-97 全部为器皿的平底。红陶。
- K.13328:98 其底部带蒸汽孔。陶色浅红。

K.13328:99-120 一组陶片，质优劣不等。除 118 号为灰褐色外其余为红陶。

K.13328:121 褐陶。直径 47 毫米 厚 7 毫米。

K.13328:122-124 3 块陶片。

K.13328:125 一个陶制物品残片，该物不像是陶罐。陶色橙红。

K.13328:126 大半个石锄或石锤。用质地紧密的灰色石头制成，在它的宽面有一柄孔。轮廓为卵形。整个端部都带有磨损的痕迹。物长约 15 厘米 宽约 10 厘米 厚 4 厘米。见 Pl.4:21。

胜金口采集品

K.13329:1 陶片，出自一器皿口沿。沿器口外表面施黑彩，自这条黑彩向下有两条相距很近的竖向黑线。红陶，质坚硬。胎泥中含粗沙。见 Pl.2:5。

K.13329:2-3 两块陶片 明显地是来自与 1 同一种样式的器皿。这两块陶片上面均带有两条相距很近的黑色线条。

K.13329:4-7 4 块小陶片，均为碗沿残片。其中的两块沿口有黑色线条。

K.13329:8 陶片，红色陶衣上面有几道黑色条纹。宽条纹成钝角状 细条纹成交叉状 见 Pl.2:6。

K.13329:9-16 8 块小陶片，带黑色条纹，可能与 8 出自同一器皿。

K.13329:17 带有黑色条纹的陶片，条纹的排列与 8 相同，但条纹要窄些。

K.13329:18-19 两块具有黑色条纹的小陶片，可能与 17 出自同一器皿。

K.13329:20 两块可拼接到一起的陶片，有黑色窄条纹。其厚度仅及其他陶片厚度的一半。见图 1。

K. 13329:21 有平行黑色条纹的小陶片。

K. 13329:22 一小块陶器的环状柄残片，带有黑彩痕迹。

托克逊采集品

K. 13331:1 陶器的长柄。红衣上面绘数组黑色斜向条纹，每一组包括三条近乎平行的线条。柄边缘涂黑色。陶色浅红 柄长 11 厘米 见 Pl. 2:7。

K. 13331:2 陶器柄上段与 1 的形状及彩绘类似 但彩绘不如 1 清晰。每组彩绘可能仅含两条黑线。柄上端与器口相接。

K. 13331:3 陶器柄上段与 2 近似 有 3 条线为一组的黑色斜向条纹。

K. 13331:4 器皿长柄把 较前几例窄 上有 3 组黑彩 每组含 4 条线，呈之字形排列。柄宽 18 毫米。

K. 13331:5 与 4 类似的陶器柄残段，但每组彩绘含 3 条黑线。柄宽 17 毫米。

K. 13331:6 陶器柄，具有一条黑色之字带状纹，带边缘有边线，边线之间为短斜线。柄宽 18—20 毫米。

K. 13331:7—15 9 块较小的陶器柄残片，其类型及彩绘与前几例同。柄宽 10—22 毫米不等。

K. 13331:16 7 块较小的陶器柄残片，上面的彩绘已近消失。

K. 13331:17 一个小器皿的口沿残片，器颈部不明显。口沿处有器柄残端 陶衣达器内口沿下 2—3 厘米处。外壁绘黑色竖向条纹，口沿内侧绘一排黑色三角纹，器柄绘黑色斜线纹。陶色浅红，含少量沙颗粒。胎厚约 4 毫米。见图 2。

K. 13331:18 小陶片，为器皿口沿，带器柄痕迹，口沿内侧的连续三角纹是唯一的彩绘图案。

K. 13331:19 陶片，该器体近球形，基部有一柄。红衣，黑色竖条纹。陶色浅红（赤土陶器）。底一定近于圆形。

- K.13331:20-38 19 块陶片，均为小器皿口沿，其类型及彩绘与 17 相似。其中 20 见图 2 该器口沿直径 10—11 厘米。
- K.13331:39 13 块小陶片，均为器皿口沿，与前几例近似。彩绘已分辨不清。
- K.13331:40-84 45 块陶片，来自与上几例同类的陶器，其中 40 见 Pl.2:9, 42 见 PL.2:8。
- K.13331:85-86 各类小陶片，一些有与上几例类似的彩绘，所有陶片质地相同。
- K.13331:87 一小块灰绿色燧石，有少许修理痕迹。
- K.13331:88 几小块人类骨骼及牙齿。

车尔臣采集品（该物自他人手中购得，据卖者称系来自考纳沙尔）

- K.13334: 彩陶瓶，瓶体球状，颈部呈风琴音栓形。瓶体最粗部稍上部位，在两侧对称各有一小耳。浅黄褐色陶，薄胎，胎泥中含少量细沙。瓶颈施浅黄色陶衣，绘黑色网格纹。黄色陶衣达瓶口内侧下方 2—3 厘米处 口内绘黑色连续三角纹。瓶体施土红色陶衣，绘黑色及浅黄彩。瓶体与颈交界处绘两条水平线，内夹 3 条波浪纹。在这组纹饰下方，是 7 组火焰纹。“火焰”被涂成浅黄色，呈倒置的 S 形。自每个“火焰”右侧顶部绘 6 根一组的黑色条纹，条纹循“火焰”的曲率弯曲，向下会聚于“火焰”的最低点。每一个“火焰”的左侧又有一组 7—9 根不等的黑色条纹自“火焰”底部向上，循“火焰”曲率会聚其顶部。瓶高 22 厘米，直径 16 厘米 口径 8.7 厘米 颈高 8 厘米。见图 Pl.1。

关于彩陶的讨论

庙儿沟、胜金口及托克逊的彩陶似乎很少有共同之处。前面两个地点之间的关联似较托克逊为多。自这些彩陶上面还看不出